

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政治属性探析

关 震 卓高生

(温州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摘 要] 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政治属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新经济政策提出的政治原因主要是纠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直接过渡”的错误, 巩固工农联盟, 调整党与机关的工作重心; 实施新经济政策的政治准则是巩固苏维埃政权,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满足人民利益诉求, 不断加强和完善俄共(布)的领导; 新经济政策的政治影响是促进了国内建设形势根本好转, 找到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道路, 推动国际政治格局逐渐形成“均势”。列宁新经济政策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 列宁; 新经济政策; 政治属性; 启示

[中图分类号]A2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 [2022]10-0023-08

DOI:10.14112/j.cnki.37-1053/c.2022.10.004

苏维埃俄国实施新经济政策的最直接的原因是和平时期“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出现的“最重要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①, 因此这一政策具有经济和政治双重属性。它的实施不仅迅速恢复并促进了经济发展, 而且在阶级关系、过渡方式、政权巩固、党的领导等方面推动了苏维埃俄国的政治建设, 帮助苏维埃俄国找到了一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道路, 壮大了国际社会主义力量, 推动国际政治格局逐步形成了某种“均势”。准确把握新经济政策的政治属性, 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一政策提出的根本原因; 深刻阐释实施新经济政策所坚持的政治准则, 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一政策推进的政治逻辑与演化的政治轨迹; 剖析新经济政策所产生的政治影响, 有助于更好地总结这一政策给苏维埃俄国带来的政治变革与留给后人的政治经验。这些对我们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具有一定的启示。

一、列宁新经济政策提出的政治原因

(一) 弥合工农联盟的裂痕, 巩固工农联盟的基础

列宁明确而肯定地指出, 新经济政策的提出“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工人阶级如何对待农民”^②。在无产阶级占少数而农民占大多数的苏维埃俄国, 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应当如何对待农民是列宁始终关注和思考的重大问题。面对严峻的国内外形势, 列宁首先尝试通过“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解决这一问题。但在战争结束转向和平建设后, 这一政策的继续实施不仅没有引导小农经济向社会主义顺利过渡, 反而引发农民的不满, 破坏了工农联盟。经过调查研究与深入思考, 列宁从苏维埃俄国的实际出发, 果断地终止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

弥合因“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造成的工农联盟裂痕是苏维埃政权需要解决的首要政治问题。列宁

收稿日期: 2022-03-06

作者简介: 关 震 (1983—), 男, 辽宁营口人, 法学博士, 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思想。

卓高生 (1979—), 男, 浙江温州人, 法学博士, 温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志愿服务。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列宁社会主义文化观研究”(项目编号: 18BKS008)、全国高校思政课建设项目“全国高校思政课名师工作室(温州大学)”(项目编号: 21SZJS33010351)、温州市瓯江青年社科学家专项课题“列宁新经济政策时期党建理论研究(项目编号: 22QN19)”的阶段性成果。

①②《列宁全集》第41卷, 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第24、50页。

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为了巩固工农联盟,优先化解农民不满;为了发展工业,优先发展农业;为了改善工人生活,优先改善农民生活的政治思路,进而作出了经济转型、产业调整、阶级互利的战略安排。具体来说,在经济方面,恢复、发展和活跃小农经济,以粮食税为切入点,实行适应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工农业流转,运用国家资本主义抵制因此产生的私人资本主义成分,由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以掌控商品买卖的范围和程度,通过合作社引导小农经济向社会主义过渡,以经济建设模式的转变促进经济发展和工农联盟稳定;在产业方面,虽然大工业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基础,但战争破坏和农业歉收导致大工业短时间内无法恢复,因此要重视发展农业,在农业提供原料的基础上逐步恢复工业;在阶级关系方面,“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政治的领导”,作为领导和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应当善于指导政治”^①,为提高农民经济的生产力创造有利条件,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为基础,进而提升工人生活质量。

(二) 纠正“直接过渡”的错误,转向“间接过渡”的政治路线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开始着手领导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并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初步的构想。但“由于军事任务突然压来”,列宁被迫中断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开始实施“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粉碎了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军事进攻和颠覆苏维埃政权的阴谋。但和平时期继续实行这一政策就犯了“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②的错误,其在政治上的表现就是“上层制定的经济政策同下层脱节”^③,引发了农民在政治上的摇摆。为尽快走出这一困境,党迫切需要制定新的政治路线。

新经济政策之“新”,在于它主张更多地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由过去的“直接”过渡转向“间接”过渡,这是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过渡理论的突破与发展,是列宁领导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重大实践创新。具体表现在:一是改行粮食税。余粮收集制是苏维埃政权在战争条件下采取的特殊策略。但是,小农只要还是小农,“就必须保证小经济有一定的流转体系”。因此,变余粮收集制为粮食税,成为战后“从政治上作出总结”^④的重要成果。二是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粮食税的实施促进了贸易流转,而“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⑤。那么应该如何对待因此而产生的资本主义呢?列宁主张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予以应对,“因为社会主义无非是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向前跨进一步”^⑥。列宁主张依靠国家掌握政权和经济命脉的方式发展国家资本主义,通过租让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制、租赁制等方式把不可避免的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确保将来把国家资本主义变成社会主义。三是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列宁主张由国家资本主义再退到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以恢复正常的经济体系,恢复小农经济。只有进行这样的“后退”,才能为日后的“进攻”做好准备。

(三) 促进党政机关职能转变,调整党的工作重心

1921年5月28日,列宁在《俄共(布)第十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新经济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中明确指出:“当前的基本政治任务是使党和苏维埃的全体工作人员充分领会和确切执行新经济政策。”^⑦

一是“机关必须服从政治”^⑧。列宁指出,当前最大的政治就是实施新经济政策,中央机关必须克服因循习气和官僚主义,增加大批新生力量,使中央机关胜任新的政治任务,推行新经济政策。他鼓励地方发挥首创精神,在一个县或一个乡创造全部经济关系“整体的”模范工作,切实推进新经济政策的有效实施。二是发挥工会教育与团结群众的作用。在列宁看来,工会是国家政权最亲密和不可缺少的合作者,在实施新经济政策时更应发挥好工会作为“共产主义学校”的作用,教育全体劳动者学习管理社会主义工业,凸显工会在密切联系群众、加强企业管理、处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各种矛盾的独特优势。三是司法工作要适应新经济政策的要求。司法人民委员部要改变在保证新经济政策实施方面软弱无能

①④⑤⑥⑦⑧《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07、24、232、202、333、65页。

②③《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93、195页。

和精神不振的工作状态,整顿人民法院的工作,确保“做生意的人”不得有一丝一毫违背法律的行为。四是注重合作社的作用。列宁高度重视发挥合作社在引导小农向社会主义过渡中的作用,认为“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的制度”^①。

1921年4月,列宁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指出,新经济政策已引起了全党的注意,“成了主要的政治问题”^②,必须向新经济政策“这门科学进军”^③,否则苏维埃俄国就没有出路。1922年1月,列宁在《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指示草案》中明确指出“必须尽一切努力让新经济政策尽可能迅速而广泛地在实践中试行。”^④随着新经济政策的深入实施,列宁要求全党工作随之作出调整。具体体现在:一是学习小农经济的运行特点,成为一个能干的“业主”^⑤。列宁要求党员深刻理解小农经济的运行特点,并运用国家资本主义将小农经济引导到社会主义方面去,这就需与个人利益相结合,以提高和增加生产。共产党员应以“业主”的身份把千百万小农联合起来,引起他们的经营兴趣,引导他们在生产中实行各种形式的联系和联合。二是学会了解商业关系,成为一个“精明的批发商”^⑥。批发商这一身份虽与共产主义似乎有天壤之别,但却是苏维埃俄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尚无法实现正常的工农产品交换的具体现实情况所决定的,这就使得商业问题成了党进行经济建设的一个实际问题,只有懂得经商,才能真正有效解决这个难题。三是以商人的身份^⑦与资本主义列强打交道。无论是向资本主义国家租让苏维埃俄国的企业,还是与西方列强开展贸易往来,共产党员都应注重商业原则的运用,以便发展、调整和扩大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改善国内人民的生活。

二、贯彻新经济政策遵循的政治准则

列宁在推行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坚持以变革经济基础带动政治建设发展,以政治进步推动经济基础稳固,以加强苏维埃政权为政治着眼点,以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为政治立足点,以体现人民利益为政治落脚点,以改善党的领导为政治保障,这些就是贯彻新经济政策所遵循的政治原则。

(一) 争取农民的信任和支持,巩固苏维埃政权

在列宁的政治思维中,社会主义革命的最本质问题“就是工人同农民的关系,就是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⑧,这不仅是十月革命夺取政权的基本条件,更是和平时巩固政权的根本遵循。新经济政策提出的政治着眼点就在于赢得农民的信任和支持,弥合工农联盟裂痕,进一步巩固苏维埃政权。

一是新经济政策提出的直接政治原因是确保对农民的领导,防止农民倒向资本家。农民通过暴动、减产减耕等方式表达对余粮收集制的不满,这就给了国内外敌对势力以可乘之机,他们挑拨农民与无产阶级政权之间的关系,动摇苏维埃政权的根基。因此,新经济政策所要解答的“全部问题在于农民跟谁走:跟无产阶级走呢,还是跟资本家走”^⑨。既要防止因过渡政策不符合农民的利益要求引发农民的动摇,又要克服因实施新经济政策而带来的资本主义成分对苏维埃政权的侵蚀。二是巩固政权的政治方式是向农民妥协。在苏维埃俄国没有得到世界其他国家的支持且自身大工业体系没有恢复的背景下,要保卫十月革命胜利成果,巩固苏维埃政权,就需要“实现自己专政的或者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农民之间达成妥协”^⑩。因此,要采取适应小农经济生产方式的过渡办法,实行粮食税,后退至国家资本主义,再后退至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流通,通过苏维埃俄国经济建设模式的改变,重新获得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理解和拥护。三是新经济政策的政治目标是巩固政权。结束国内外战争后的苏维埃俄国面临着既有的和新生的资本主义对苏维埃政权的威胁,也面临着再次进行社会主义过渡可能失败带来的执政危机。因此,新经济政策通过巩固工农联盟、夯实经济基础、转变过渡方式以达到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政治目的。

①⑦《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69、74页。

②⑩《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54、51页。

③④⑤⑥⑧⑨《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04、300、187、187、344、196页。

(二) 在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

新经济政策虽在形式上向资本主义主动让步,在一定范围内复活了资本主义,苏维埃俄国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发展贸易往来等创新举措恢复和发展经济,但坚持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始终未变,理论上的突破与实践上的探索都是为了向社会主义顺利过渡。面对苏维埃俄国面临的严峻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困难,列宁在思想理论上主动求变,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式由直接、简单转变为间接、迂回。同时,列宁主张充分而巧妙地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在理论方面,列宁多次提及自己在1918年所写的《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小册子中对国家资本主义的论述,指出苏维埃政权不必对国家资本主义感到可怕,“因为苏维埃国家是工人和贫民的权力得到保障的国家”^①。国家资本主义在革命民主国家中“必然会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或一些步骤”^②,只有掌握了国家资本主义“全副王牌”,才会使社会主义的巩固有了保证。在实践方面,列宁虽主张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但他始终是将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③,主张推动工人阶级学会如何保卫国家秩序来反对小私有者的无政府性,学会怎样根据国家资本主义原则来整顿好全国性的大生产组织,消除无秩序、经济破坏和松懈现象。对于备受争议的租让制,列宁始终没有忘记“租让政策是一方为了反对另一方结缔的联盟”^④,究其目的依然是为了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逐利性和敌对关系,在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中生存下去,赢得喘息机会,以加快国内社会主义建设,提高生产力,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

(三) 重视人民利益诉求,满足人民发展需要

凸显人民主体地位,满足人民利益需求是列宁推行新经济政策的政治落脚点。这不仅与列宁一贯坚持的执政理念相契合,更是新经济政策提出并实施的根本原因。在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时期,不仅需要伟大革命所激发的政治热情,更要“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⑤。一方面,新经济政策充分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列宁坚信“只有我们正确地表达人民的想法,我们才会管理”^⑥,因为苏维埃政府是“代表工人阶级的,是代表能够同占农民十分之九的劳动农民妥协的劳动者的”^⑦。面对1921年春天的政治危机,“必须以同农民个人利益的结合为基础”^⑧,实行粮食税,发展农业和工业间的流转,发展小工业。在实现农民利益的基础上实现工人利益,提高工人的生活质量,发挥工人的国家主人翁作用,带领人民向社会主义过渡。另一方面,用新经济政策检验我们满足人民利益的工作效果。一是检验是否真正做到了同农民经济结合。同农民经济结合是新经济政策的意义所在,更是开展工作的政治原则。同农民群众汇合起来,虽然刚开始一道前进的速度比期望的慢得多,但得到全体群众的支持,“前进的步子就会加快到我们现在梦想不到的速度”^⑨。二是检验国营企业是否赢得同资本主义企业竞赛的胜利。国营企业是苏维埃俄国的经济支柱,国营企业与资本主义企业建立合营公司,在这种可以展开生产竞赛的形式中,使得俄共(布)深知自己并不懂经济事务这一行,必须“从头学起”^⑩,以偿还人民贷给俄共(布)的贷款这一“政治期票”。三是检验是否掌握运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本领。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国家资本主义“连马克思也没有想到要就这个问题写下只言片语”^⑪,同工人阶级国家相连的国家资本主义是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过程中的最有效最可行的手段,是“人民所需要的,少了它就不能生活”^⑫。但苏维埃俄国的无产阶级却缺乏掌控和运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本领,这也需要从头学起。同时也要防止非法活动分子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破坏苏维埃俄国经济,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

①②《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78、281页。

③④⑦《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17、159、64页。

⑤⑧《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87、201页。

⑥⑨⑩⑪⑫《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3、81、87、87、88页。

(四) 加强和改善俄共(布)的领导,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

俄共(布)是新经济政策制定与推行的组织和领导力量,列宁始终注意在实施新经济政策过程中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既通过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促进新经济政策不断深入、细化和落实,也通过新经济政策调整党的工作内容,检查党的工作效果,提升党的领导水平,巩固党的领导地位,形成党建与施政相辅相成的良性循环的政治态势,完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治任务。一是确保党清晰地知道自己的任务与使命。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需要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①。为了完成这一使命,需要从根本上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并恢复苏维埃俄国大工业基础,但在联维埃俄国当时的现实情况下,要恢复大工业,发展生产力,根本任务就是实施新经济政策。二是确保党清晰地知道自己的“敌人”。在实施新经济政策的过程中,列宁清醒地指出,随着这一政策的实施,党面临着三个“敌人”,即“小私有者的自发势力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承租人和租借者则是较次要的敌人。官僚制度和官僚主义弊病也是我们的敌人”^②。而党自身也存在着“(一)共产党员的狂妄自大,(二)文盲,(三)贪污受贿”^③等问题。面对内部和外部“敌人”,为防止资本主义沉渣泛起,防止各种资产阶级思想乘虚而入,防止自身问题影响党群关系,引发执政危机,列宁主张通过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来改正缺点、击败敌人。三是确保党清晰地知道如何使用过渡策略。列宁强调党不仅要知道需要经过哪些中间环节,而且要知道如何运用这些中间环节,“才能使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关系过渡到社会主义”^④。这一过渡策略向党提出了执政策略上的要求,那就是学会必需的艺术即“灵活机动”^⑤。

三、新经济政策产生的政治影响

改行粮食税开启了苏维埃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崭新尝试,这一探索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功。在国内方面,苏维埃俄国国家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工农联盟得以巩固,经济基础得以夯实,政权机关工作能力得以提升,并最终找到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道路。在国际方面,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制度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号召力和感染力,为国家发展赢得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并进一步发挥着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作用。苏维埃俄国国内建设与国际地位的变化,充分展现了实施新经济政策带来的政治影响。

(一) 找到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道路,国内建设形势根本好转

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实施,顺应了小农生产生活的特点,激活了工农业经济间的流转,确立了苏维埃政权机关新的工作方向,转变了机关的工作作风,扭转了农民与工人对苏维埃政权不满的态度,巩固了工农联盟,帮助苏维埃俄国最终找到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道路。

第一,夯实了苏维埃政权的政治基础。新经济政策符合农民生产生活的规律,调动了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的生产建设积极性,工农联盟得以进一步巩固。一是消除了农民的不满。实行粮食税后,农民克服了饥荒和自然灾害的困难,地主和资本家丧失了中伤社会主义经济的群众基础,普遍存在的农民暴动逐渐消失,“农民对他们目前的境况是满意的”^⑥。二是农民更加拥护苏维埃政权。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让农民更加清楚地感受到苏维埃政权是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农民的不满消除后,出现了“很难有比农民更拥护我们的人了”^⑦的大好局面。三是将农民纳入国家经济建设的依靠力量之中。“同千百万农民赖以生存的农民经济结合起来”^⑧的新经济政策,实质上是同农民一起建设国家经济,“使我们在大工业和农业中的社会主义工作同每个农民从事的工作结合起来”^⑨。这种结合从眼前做起、从农民自身的现实利益做起,这就将农民纳入国家经济建设总体中来,赢得了农民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支持。

第二,激活了苏维埃俄国的经济体系。新经济政策以发展农业为起点,以恢复工业为目标,以国家

①③⑤《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80、210、187页。

②④《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79、216页。

⑥⑦⑧⑨《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84、287、79、80页。

资本主义为手段,以商业为纽带,推动苏维埃俄国经济全面复苏,进一步稳固了国家政治体系。一是农业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促进了农村生产力发展,解除了农民的后顾之忧,农民积极拓展耕种面积,主动饲养牲畜,实现农产品的增产增收。1922年3月,第一次征收粮食税的计划顺利完成,“一年来农民不仅战胜了饥荒,而且缴纳了大量的粮食税”^①,1922-1923年第二次征收粮食税也是在极其有利的条件下展开的。^②二是工业发展态势良好。与人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轻工业出现了普遍高涨的局面,工人生活状况明显改善,尤其是“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工人生活状况的改善是毫无疑问的”^③。重工业也有了某些发展,尤其是资金紧缺问题显著改善。三是商业和金融体系初步建立。国家经营商业,将其作为纽带和关键链条,“能够保持农业和工业的巩固阵地并向前走”^④。卢布逐步稳定,有助于苏维埃经济“在坚固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下去”^⑤。四是国家资本主义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苏维埃俄国通过租让制、租赁制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往来,帮助苏维埃俄国获得了国家发展所必需的物资,改善了人民生活。随着商业的不断发展,合营公司逐步成立,社会主义国家有机会学习做生意并赢得与外国资本家竞赛的胜利,丰富了苏维埃俄国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的方式。

第三,赋能苏维埃政权机关工作。苏维埃政权机关是新经济政策的执行者,为了充分发挥新经济政策的效能,苏维埃党政机关不断调整工作思路,改善工作方式,提升工作效率。一是将学会做经济工作放在首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学会了解商业关系和经商是我们的责任”^⑥为工作原则,扭转过去只是简单地通过行政命令掌控国家经济发展的工作方式方法,从苏维埃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遵循经济规律,建立经济体系,解决经济难题。二是进一步明晰党政机关的职能。列宁提出不能否定党的领导,但也不能以党代政,应明确划分党与苏维埃机关的各自职权,逐步完成精简苏维埃机关机构、克服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减少非生产性开支等任务。三是不断完善领导工作机制。1921年苏维埃政权任命了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便于国家事务的管理及新经济政策的推行。列宁要求副主席在做好检查法令、法律和决定的实际执行情况的基础上,在国家机关里负责建立一两个模范部门以起到示范作用,要求机关工作人员要深入基层了解实情。四是加强和改进监督监察工作。列宁通过建立个人负责制,改正了苏维埃国家机关对政策和法令执行缺乏检查和监督的缺点,他要求工农检察院要切实发挥作用,通过扩大中央监察委员会实现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监督检查。五是以学习的方式改造国家机关。面对几十万沙皇时代和资产阶级社会遗留下的旧官吏自觉不自觉地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情况,列宁主张在实施新经济政策过程中通过学习的方式给予应对。一方面在实践中学习国家机关工作的全部内容,另一方面通过选拔苏维埃学校和工人预科培养出来的青年,改变机关的工作面貌。

第四,找到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新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意味着列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由之前脱离国情的“直接过渡”转向符合苏维埃俄国实际的“间接过渡”道路,即“新经济政策的俄国将变成社会主义的俄国”^⑦。列宁过渡思想的改变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过渡方式发生转变。苏维埃俄国通过“战时共产主义”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失败以后,列宁主张通过实施新经济政策实现过渡方式由“强攻”转变为“围攻”、由“直接”转变为“迂回”。在具体的实践中,实行粮食税,允许地方流转,“退却”到国家资本主义,再“退却”到国家调节商业和货币,通过以退为进的方式积聚力量,最终实现顺利过渡的目的。二是承认需要较长的过渡时间。根据苏维埃俄国的国情,一方面在旧的经济基础上恢复大工业生产需要至少几十年的时间,而在遭受战争破坏的情况下,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另一方面需要花几代人的时间改造小农生产生活方式,这就决定了新经济政策“是一个要在若干年内长期实行的政策,要求一切工作人员极其仔细和认真地加以执行”^⑧。三是过渡任务艰巨而

①③④⑤⑦《列宁全集》第43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84、285、287、283、306页。

②[苏]A·A·丹尼洛夫等主编《俄罗斯历史(1900—1945)》,吴恩远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0页。

⑥《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48页。

⑧《列宁全集》第41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333页。

复杂。在经济方面,面临着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在政治方面,面临着团结小生产者,实现向社会主义“间接过渡”,在巩固工农联盟的基础上转变俄共(布)和苏维埃机关的工作内容和工作作风,继续完善新经济政策的任务;在文化方面,面临着提高国家整体文化水平,以文化建设促进经济和政治建设的任务。

(二) 社会主义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国际政治格局逐渐形成“均势”

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捍卫和巩固了十月革命胜利果实,逐步改变了国际政治格局,使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并存共生。第一,两种社会制度并存,与资本主义制度形成某种“均势”。新经济政策的实施进一步增强了苏维埃俄国的国力,造成了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均势”:一方面,国际资产阶级依旧仇恨和敌视苏维埃俄国,时刻准备侵犯它;另一方面,国际资产阶级花费重金进行的一切军事行动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一特殊局面的形成,展示了实施新经济政策后的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产生了巨大的国际政治影响:一是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反对进攻苏维埃俄国的运动风起云涌,这些国家普遍成立了共产党,在无产阶级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二是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利害冲突不断加深,资本主义国家很难再次形成同盟对苏维埃俄国发起新的攻击。三是东方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占世界人口大多数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劳动群众已经觉醒,他们积极参加政治运动,不断冲击世界政治秩序和殖民体系。这就造成了国际帝国主义虽比苏维埃俄国强大,但又不得不承认它,由此形成了一种国际格局的均势,这种均势使“社会主义共和国毕竟能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生存下去了”^①。

第二,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往来,打开了苏维埃俄国的外交局面。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后,列宁准确地判断出资本主义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迫切要求发展、调整、扩大同俄国的贸易往来,这就为苏维埃俄国打开外交局面提供了可能。一是资本主义国家从自身实际出发,与苏维埃俄国建立外交关系。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结束的当天即1921年3月16日,英国在伦敦与苏维埃俄国签署了贸易协议,标志着英国事实上已经承认苏维埃俄国。二是以国际会议为契机,争取尽可能分化敌人。1922年4月,苏维埃俄国向西方列强提议召开的国际会议在意大利热那亚城举办,列宁要求代表团不仅要以商人的身份参加会议,为广泛而顺利地发展贸易创造条件,也要积极争取在资本主义阵营中希望和平并与苏维埃俄国建立经济关系的和平主义者。这样做的目的是区别对待资本主义阵营中主张用武力解决问题和主张和平主义的人,达到分化敌人的目的。三是利用帝国主义阵营中的矛盾,瓦解资本主义国家反苏同盟。帝国主义阵营并不是铁板一块,其内部存在着各种矛盾。苏维埃俄国要充分利用这一点,首先在拉帕洛与德国签订条约,戳穿资本主义国家结成反苏联盟的阴谋。在随后的1924年,作为西方世界政治领袖的英国在外交上承认了苏联,成为苏联第11个外交国,同年又有更多的国家承认了苏联。^② 这些国家与苏联建交实质上结束了对苏联的外交封锁,苏联走出了外交困局,进一步扩大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

第三,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推动殖民地国家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始终以世界眼光理解社会主义,不仅在理论上实现突破,更通过十月革命与新经济政策的实践为被压迫民族作出示范。一是高度关注殖民地国家争取民族解放的运动。列宁一直致力于纠正第二国际与第二半国际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工人政党对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解放运动的错误态度,他反复指出,在未来世界革命决战中,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所起的作用将比我们预想的要大得多。二是以自身的实践为被压迫民族追求解放提供参考。苏维埃俄国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过程中虽经历了失败和挫折,但事实是“用奴隶反对一切奴隶主的革命来‘回答’奴隶主之间的战争的诺言,千百年来第一次得到了彻底的实现”,并在克服一切困难中继续得以实现,这就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提供了示范,社会制度变革的“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道路已经指明”^③。三是引领共产国际向前发展。十月革命后,尤其是新经济政策实施

①③《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186页。

②[苏]A·A·丹尼洛夫等主编《俄罗斯历史(1900—1945)》,吴恩远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0页。

以后,列宁主导建立的共产国际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联系更加紧密,“向全世界高举社会革命的火炬”^①,点燃了被压迫民族和地区的社会主义革命。

四、启示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列宁新经济政策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彰显出的政治属性和经验启示多次被提及。毛泽东认为,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②。邓小平也指出,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③。因此,深入分析和准确把握新经济政策的政治属性,对我们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 发展经济是最大的政治。列宁新经济政策遵循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从苏维埃俄国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基本矛盾出发,正确处理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的辩证关系。列宁主张从关系苏维埃俄国农业经济核心的粮食税入手,逐步涉及地方贸易、国家资本主义、商业与货币关系、市场运营等经济体系的重构与发展,进而巩固工农联盟,加强苏维埃政权,调整苏维埃机关与职能部门的工作重心,通过夯实经济基础稳定了政治上层建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顺利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目前正向着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前进。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没有改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任务没有改变,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没有改变。我们要继续坚定不移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 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方向。在新经济政策的酝酿、颁布、实施与完善过程中,列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从苏维埃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切实利益。新经济政策虽然改变了过去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和具体方式,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治方向从未动摇。同时,随着新经济政策实施带来的资本主义复苏危险,列宁始终正面回击,并在掌握政权和国家经济命脉的基础上,巧妙地运用多种方式给予应对,以防范资产阶级势力对苏维埃执政基础的攻击、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对人民的腐蚀。目前,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仍处在低潮,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应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始终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实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社会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不断为世界各国发展和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在自身不断发展的同时,为世界各国发展提供更多的参考和选择。

(三)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政治保障。新经济政策代替“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对俄共(布)执政提出全新的工作目标和要求,需要俄共(布)学习新的工作本领。正是在以列宁为代表的俄共(布)的坚强领导下,新经济政策得以贯彻执行,工农联盟得以巩固,苏维埃政权得以稳定,苏维埃俄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并且随着俄共(布)领导的不断改善和加强,新经济政策得以进一步完善并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我们要把党的政治建设始终摆在首位,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继承和发扬伟大的建党精神,在党的坚强领导下,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向前发展,顺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责任编辑:周文升)

①《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5页。

②《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0页。

③《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页。

ISSN 1003-4145 CN37-1053/C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 CSSCI 来源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及 CCM 中国权威学术期刊 (A+) / 第四届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第三届山东省新闻出版奖·报纸期刊奖 / 2011 年山东省优秀期刊

山东社会科学[®]



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2022 10 (总第 326 期)



山东社会科学

月刊 1987年5月创刊

马克思主义研究

- (5)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着魔的资本拜物教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研究 张一兵
- (16)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斗争思想及当代启示 张小秋
- (23) 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政治属性探析 关震 卓高生

文艺理论与批评新探索

- (31) 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资源的阐释方法 朱志荣
- (40) 从“发愤”到“意淫”: 中国创作动机理论的发展 杨子彦
- (50) 魏晋六朝文学简阔精神的生成逻辑 陈玉强
- (58) 价值关系视野中文艺学的“科学性” 许超旋

文化研究

- (68) 人文精神力量与中华民族理统
——试从国学角度论析之 王化学
- (75) 公共文化服务研究热点与前沿的知识图谱分析
——基于 CSSCI(2002—2021)数据 王秀伟
- (85) 乡村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建构路径研究 王成利 曹冰 程静静

历史学研究

- (92) 明清之际驿站财政制度的变革 刘文鹏 屈成
- (102) 从个体记忆到社会记忆: 五三惨案的记忆生产与宣传塑造 郭辉 侯育前

2022年第10期

总第326期/每月5日出版

经济研究新视野

- (111) 基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研究 彭淑贞 刘艳梅 吕臣
- (118) 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时空分异研究 李昕 王淑娟
- (128) 数字化转型能提升商业银行效率吗? 孙中会 逢苗苗

哲学与社会发展研究

- (138) 科技事故三重“责任主体”的确立及其规范逻辑
——基于约翰斯“责任原理”的考察 叶立国
- (146) 基层社会公共卫生危机管理制度韧性及其治理逻辑 胡艳蕾 梁丽霞
- (155)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世界历史叙事 王玉梅 毛华兵

法学研究

- (163) 从刑事法学角度解析《反有组织犯罪法》 牛志志 王顺安
- (169) 人工智能时代的刑事治理立场
——基于主体、风险与责任的考量与建构 徐永伟
- (176) 诉讼当事人对法律的矛盾态度及其应对策略
——以两起诉讼为例 赵静

- (184) 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争议问题与完善路径 刘成安 杨志延

本刊实行匿名审稿制度, 不以任何形式收取版面费。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63098272。

山东社会科学® (月刊)

SHANDONG SHEHUI KEXUE

2022年 第10期 总第326期 2022年10月5日出版

主管 主 办 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编辑 出 版 《山东社会科学》杂志社
主 编 刘要停

国 内 发 行 济南市邮局
订 购 全国各地邮局
国 内 邮 发 代 号 24-135
国 外 发 行 代 号 MO 1276
国 外 发 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北京 399 信箱)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3-4145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7-1053/C
广告发布登记证号 鲁广发登字 3700005043 号
本 刊 地 址 济南市舜耕路 46 号
邮 政 编 码 250002
电 话 (传 真) 0531-82866273
网 址 www.sdshkx.com
印 刷 山东黄氏印务有限公司
定 价 25.00 元
装 帧 设 计 王金军 (山东大学)

